

近代中國的「家國」想像與數位人文研究： 以老舍的「祖國之愛」解析為例[#]

楊瑞松*

理解中國如何從傳統「王朝」觀念，轉變成如今我們所理解的現代「國家」觀念，和中國人的自我認同如何從「臣民」轉為「國民」，以及百年之間中國人如何容受西方現代諸多觀念，並對西方現代觀念進行「中國化」之過程是我近年來一系列關於近代中國國族論述想像的各種面向的研究重點。此次由本人主持的有關近代中國的「家國」想像的議題，即是立基於我近年來關於近代中國國族主義各種面向的基礎。研究的資料基礎除了包含 1.2 億字「中國近現代思想史專業數據庫（1830-1930）」外，其他如中研院的「漢籍全文資料庫」和「申報」數據庫，以及各類電子數據化的文學作品均有重要檢索參考作用。

本子計畫關注焦點之一即是「祖國」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誠如沈松僑所言，百年來「無以數計的個別的『國民』、奉獻犧牲、相率投身於營造中國現代國家的歷史使命之中」（沈松僑，2002）。然而弔詭的是，約當一百多年前，亦即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的初期，當時中國知識分子卻是一再感嘆中國人幾乎毫無國家意識，根本無所謂愛國之情，可謂對於國族處於「無感」的狀態。梁啟超即認為中國人根本不知道什麼是國，「既無國矣，何愛之可云？」（梁啟超〈愛國論〉，1899）。孫中山更是經常痛陳中國人是「一盤散沙」，因為「中國人最崇拜的是家族主義和宗族主義，所以中國只有家族主義和宗族主義，沒有國族主義」（孫中山《三民主義》，〈第一講〉，1924）。青年陳獨秀在 1904 年時，更是極為生動地描述他自己國族意識的啟蒙過程：「我

[#] 本文內容部分改寫自：楊瑞松（2014），〈從「正紅旗下」到紅旗下：老舍的「祖國」之愛〉，Issues of Far Eastern Literatures: The 6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Saint Petersburg State University/Society of Lao She Studies.

*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十年以前，在家裡讀書的時候，天天只知道吃飯睡覺。就是發奮有為，也不過是念念文章，想騙幾層功名，光耀門楣罷了。那知道國家是什麼東西，和我有什麼關係呢。到了甲午年，才聽見人說有個什麼日本國，把我們中國打敗了。到了庚子年，又有什麼英國、俄國、法國、德國、意國、美國、奧國、日本大國的聯合軍，把中國打敗了。此時我才曉得，世界上的人，原來是分做一國一國的。此疆彼界，各不相下。我們中國，也是世界萬國中之一國，我也是中國之一人。一國的盛衰榮辱，全國的大都是一樣消受，我一個人如何能逃脫得出呢？我想到這裡，不覺一身冷汗，十分慚愧。我生長二十多歲，才知道有個國家，才知道國家乃是全國人的大家，才知道人人有應當盡力於這大家的大義。」（陳獨秀〈說國家〉，1904）

究竟是哪些重要的歷史因素，使得一百多年前在中國可謂是幾乎不存在的國族意識會演變成為主導（甚至主宰）近代中國人思維的一股重要力量呢？換言之，如果說晚清時期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所形塑的近代中國知識分子之危機感，促使「國民」的權利論述，在其草創誕生之際，即臣服在「國家」巨靈的陰影下，而各類相關的文明論，也都在「國民國家」思維框架束縛下，不脫以中國為中心的論述。那麼本計畫所要追問的是：是哪些其他重要歷史因素，尤其是近代中國國族論述想像本身的若干特色，能使得國族意識在百年來發展上深入人心，演變成為時至今日一股根深蒂固，歷久不衰的形塑思想價值和心理情緒的強大力量呢？具體而言，我近年來研究探討的一個重要焦點即在於近代中國的國族意識建構發展過程中，是哪些有關國族的重要論述想像，從晚清以降一再地召喚全民一體榮辱與共的集體認同感，並且持續強化了全體生存危機意識，因而使得國族集體認同情感持續發揮強大的影響力？基於此問題意識，本計畫企圖從若干新的視角和研究取徑來系統性瞭解此種國族意識在近代中國的建構發展的複雜過程，尤其是分析這種集體意識如何滲透至日常生活中深入廣大的人心，發揮強大的情感動員力量。

Anderson 更進一步指出，國族能夠之所以會具有一種「有機共同體之美」的一個重要關鍵，正在於對於國族的語言表述往往是帶有親屬關係的語彙，例如 *motherland*, *fatherland* (Anderson, 1991)。這種具有家族特色的表述方式讓國族和其成員個體之間的關係轉化為一種「自然而非人為選擇」的聯結關係，國族成為一個如同家庭般的「自然」社會組織。國族被設想為展現無私的愛和團結的團體，而非是一種由法律所界定的政治契約的組織；國族所共同

居住的 homeland，被界定為由遠古的先祖所建立的「共同家業」，成為每個成員所應當保護捍衛的「大家園」。而正因為如此，每個個體為國族犧牲性命的無私奉獻，被視為具有無上的道德崇高性和純粹性個別家庭的大家族，而愛國主義論述往往透過特定語詞的運用形塑，以充滿訴求家庭成員之相親相愛的情感，號召國族的成員為這個「大家族」犧牲奉獻，甚至不惜以犧牲自己真正的家庭為代價。

本研究所欲探討的「祖國」主題，即是企圖仔細探討有關近代中國日常生活中，以「祖國」之名的論述和相關歷史記憶及其文化實踐所具有的巨大國族意識形塑力量。另一方面，本研究之所以企圖重新嚴格省視「祖國」在近代中國國族日常生活意識的重要性，也可謂啟迪於 Michael Billing 在 *Banal Nationalism* 一書的洞見，他指出國族認同 (national identity) 形塑過程的一個重要關鍵議題，正是作為國族的「我們」(the national “we”) 是如何被建構而成，而這個被建構的「我們」又被賦予何種意義。這些建構的過程往往因為不斷在日常生活中進行，以致於成為人們習以為常的「自然現象」。在近代中國日常生活國族意識的建構過程中，時至今日，「祖國」意識和其語彙的使用無疑已達到這種大眾幾乎習以為常的「自然現象」。

根據我目前的考察，透過關鍵詞檢索「中國近現代思想史專業數據庫 (1830-1930)」，具有現代國族意涵的「祖國」一詞開始大量出現在二十世紀初期的留日學生刊物，如《江蘇》、《浙江潮》、《湖北學生界》所刊行的文章中。例如在 1903 年出刊的第一期《浙江潮》中的〈國魂篇〉，即不斷以「祖國」的字眼，強調「凡我同國之人，皆我祖所自出，皆吾同胞之兄弟也」以號召「誓死以守祖國」的愛國情操，並認為唯有效法德國和義大利的「祖國主義」(nationalism) 才能激發國族認同情感以召喚國魂。更諷刺的是，在依據共產黨意識型態所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語境中，亦即應該是信奉「工人無祖國」的國度內，「祖國」一詞卻是大為風行，用來稱謂歌頌自己現在所居住的中國舉凡「偉大社會主義祖國」、「祖國在我心中」、「祖國的花朵」、「歌唱祖國」、「祖國統一」等各類不勝枚舉的以「祖國」之名來號召認同情感的表述，均早已是現今中國人在日常生活中習以為常的歷久不衰現象。

然而近代中國這種「祖國」熱的現象，並非沒有明顯的例外情況。在我以知名的作家老舍為主題的研究，即可以看到一種有關「祖國」一詞運用的相當弔詭情況。而到目前為止，老舍的作品已大量數位為電子文件檔，因而可



藉由關鍵詞的檢索，並配合我們所知悉的歷史背景變化，從而得知過往為學界所忽略的現象。老舍對於「祖國」一詞態度的一百八十度大轉變，正是透過此研究才能加以釐清。以下將以我關於老舍課題的研究論文為基礎來加以說明此重要歷史現象（楊瑞松，2014）。

老舍的一生（1899-1966）跨越了近代中國的大變動時期：他從大清帝國的臣民（而且是屬於其核心的滿人族群），成為中華民國時期的國民，最後更成為社會主義新中國的熱切擁抱者。若借用老舍作品的符號而言，他可以說是生於「正紅旗下」，而卒於紅旗下。他所經歷的政治大變動，包含著血淋淋的革命和武力鬥爭過程，期間更充斥大規模族群仇恨心理動員，或是階級鬥爭意識型態的激烈對抗。尤其是在老舍的幼年時期，當時風起雲湧的反滿革命宣傳，例如著名的鄒容的《革命軍》，無不大力宣揚滿漢族群之間的不共戴天之仇和勢不兩立的衝突局面（楊瑞松，2012）。

在這樣歷史背景成長的老舍，如何面對以漢人意識為主導所建立的中華民國，並成為這個最後在名義上強調「五族共合」的新國家成員，的確是一個有趣的現象。當然，有若干無法認同的這種政治新局，甚至以「民國乃敵國」為念的「清遺民」（這些遺民之中不乏在族群屬性上是屬於漢人者），選擇了拒絕排斥，甚至對抗民國的立場（林志宏，2009）。然而，從老舍的生平看來，他並未選擇這樣的清遺民認同。相反地，誠如許多作者指出，老舍（尤其是在1949年之前）選擇一再隱藏自己族群屬性的作法，「堅持不在廣眾之前談論個人的滿族身分，也不在作品中標榜其滿族文學的創作性質」（關紀新，2008），而以「中國人」意識呈現他的國族認同。他甚至在其名作《茶館》中，藉由常四爺之口，說出「我是旗人，旗人也是中國人哪！」；亦即以辛亥革命之後標舉的「五族共和」理想，駁斥了革命前反滿文宣中「驅逐韃虜，恢復中華」的漢人中心主義和排滿意識。

從老舍的諸多作品看來，尤其是《正紅旗下》關於滿人族群的批判反省來看，老舍「旗人也是中國人」的立場，是將二者視為一體，同時也將大清帝國由盛而衰的滄桑史，視同為一部中華民族興亡史的縮影。換言之，從老舍的「中華民族史觀」而言，由清至民國，由民國到人民共和國，儘管期間有種種大變動，都是一個民族發展史的連續發展過程。他對於過程中的權力更迭所造成的種種社會問題，甚至個人或族群所遭遇的困境，雖然有種種批判和不平之鳴，卻沒有改變他對於中國的「祖國」之愛，例如他並未選擇參與「滿

洲國」的「復興滿族大業」；或是離開中國，成為新的國度的公民。

巴金曾稱讚老舍為「新中國最偉大的歌德派」、「把整個生命和全部精力都貢獻給了祖國」，是「偉大的愛國者」(巴金〈懷念老舍同志〉)。而老舍在北京的故居，現在也成為「愛國主義教育基地」。當然，從老舍的許多作品，尤其是以「愛國」為主旨的作品如《四室同堂》、《無名高地有了名》等等作品而言，老舍作為「熱愛祖國」的典範人物，可謂是當之無愧。然而，另一方面，他在文革中的悲劇性生命終絕方式，卻使得他的愛國光環出現了一種曖昧性。如同王德威所言：「我們不禁好奇、當他(老舍)溺水自戕時，心中是否也想著常四爺那句情詞激越的臺詞：『我愛咱們的國呀，可是誰愛我呢？』」根據王德威的分析，老舍的愛國論述中，事實上不斷地出現「存在主義式」的焦慮。(王德威，2009)

簡言之，對於一位在當今時常被推崇為「熱愛祖國」的偉大作家的老舍而言，他本身作為一偉大的文學創作家，是否對於表述「祖國」之愛的語言符號有些特別的見解／文化實踐及重大態度轉變，是本論文感到好奇之處。首先，我們可以發現到，在老舍的重要作品中，尤其是1949年以前的作品，「祖國」一詞出現的頻率非常非常低。在他最重要的抗戰時期愛國小說《四室同堂》的長篇大作中，更是完全不見此字眼的出現。相較於同樣是抗戰時期的諸多愛國文藝作品，例如〈黃河大合唱〉明顯標舉「保衛黃河，保衛祖國」的口號，「祖國」字眼在老舍作品的「缺席」現象，不免令人覺得奇怪。

然而，更令人驚訝的發現，乃是老舍是具有自覺意識地排斥使用「祖國」字眼在其創作上。在他於1936年完成的《老牛破車》所收錄之〈閒話我的七個戲劇〉一文中，老舍有如下一段論述：

跟我寫小說一樣，我向來不跟著別人跑，我的好處與壞處總是我自己的。無論是小說還是劇本，我一向沒有採用過“祖國”和“原野”這類的字；我有意的躲著它們。這倒不是好奇立異，而是想但分能不摹仿，即不摹仿。

在這一段特別以「祖國」字眼為例的說明中，老舍明確地強調自己不追隨主流風潮的寫作風格，而「祖國」字眼正是他想到的最具代表性之負面例證。而更有趣的是在他1942年間發表的〈形式·內容·文字〉一文中，他又再一次以「祖國」等字眼作為負面例證，視它們是一些極為容易拼湊的字眼，無法展現



文學創作者精心煉製文字用語的苦心：

我們的心中應先有了某人某事某景，而後設法用文字恰當的寫出；把“怒吼吧”、“祖國”、“原野”、“咆哮”……湊到一塊兒，並不算盡了職責！我們的文字是心中制煉出來的言語，不是隨便東拾一字，西抄一詞的“富貴衣”。小說注重描寫，描寫仗著文字，那麼，我們的文字就須是以我們的心鑽入某人某事某景的心中而掏出來的東西。這樣，每個字都有它的靈魂，都有它必定應當存在的地方；哪個字都有用，只看我們怎樣去用。若是以為只有“怒吼吧”、“祖國”……才是“文藝字”，那我們只好終日怒吼，而寫不成小說了！

如果我們從近代中國民族主義論述（或是國族論述）的歷史發展脈絡，來好好檢視老舍處處所顯示的對於「祖國」字眼的排斥態度，則是相當令人玩味。

我們可以看出，當老舍在 1936 年明言，他不追隨流俗去使用「祖國」（在措詞表達上，SAY NO TO「祖國」）的作法和想法，不啻是一種文藝創作者堅持自主風格精神的展現。當然，事實上也證明，老舍這樣的堅持並不妨礙他陸陸續續以各種重要作品，深切表達他對他所認同關懷的中國，提出許許多多令人共鳴的文化反思。

然而，老舍的這項不使用「祖國」字眼的堅持態度，顯然在 1949 年後，在他由美國返回中國，在他熱烈地擁抱新中國後，有了 180 度的大轉變。最明顯的證據，即是他在成為「人民藝術家」後，於 1954 年所發表的報導文學作品《無名高地有了名》。在這一長篇小說中，「祖國」字眼大量出現，甚至在一段文字敘述中密集地出現。例如：

「同志們！我身上的一絲一線都是祖國人民給的。祖國給的衣服緊挨著我們的肉皮！能為保衛祖國粉身碎骨是我的最大幸福！完了！」話雖短，可是很具體。他說完，馬上有幾位青年去摸自己的厚厚的棉衣，好像摸到衣服，也就摸到了祖國。

或許老舍的這項轉變，可以被解釋為是因為報導文學的性質，導致他如實地記錄了他在朝鮮戰場所聽聞的「祖國」表述。然而，如果再從他在 1949 年之後所發表的一些評論文章來看，上述的解釋似乎又不能成立。例如在他 1956 年所發表的〈青年作家應有的修養〉一文中，老舍有如下的陳述：

我們需要看看祖國的高山大川，祖國百廢俱興的建設，領導祖國建設的偉大人物，使我們更認識祖國，更熱愛祖國，以期把我們所寫的一個地方的事物和祖國建設的整體聯繫起來，從一個地方的一個人物或一件事情看出社會主義建設的幸福遠景。

從這些例證看來，老舍在 1949 年後放棄對於「祖國」符號的負面態度，重新擁抱「祖國」的作法，或許可以視為他這位「尚未改造好的資產階級舊知識分子」(江青語)，努力企圖「重新學習」，實踐「文藝作品是要拿到人民中間去的，不再是給自己與幾位知音去欣賞的文字把戲」(老舍，1950 年報刊投書語)的新覺悟的一項重要轉變。只不過，《茶館》中的對白「我愛咱們的國呀，可是誰愛我呢？」，以及老舍悲劇性之生命終結方式，始終成為一個盤旋在他重新擁抱「祖國」之生命抉擇上的幽靈，不斷令後人反覆思索老舍「祖國之愛」的曖昧性。

2014 年 6 月間，我曾前往瑞士洛桑大學，以本研究相關的一些初步構想作口頭報告。會議間一位與會者提出一項質問：大多數的數位人文研究，似乎側重以各類數位方法整理大數據資料；但是對於文本內文的解讀，尤其是 close reading 似乎反而有忽略的現象。在我的回答中，我也表達對於其所提出質疑的同感，並認為善用大數據資料的同時，人文學的解讀分析詮釋文本，仍是不可或缺的研究取徑。我關於「祖國」的研究，尤其是老舍作品中對於「祖國」一詞運用的轉變，即是藉重數位檢索和文本分析從而得到一些新發現，也自我期許日後能夠依此研究取徑獲得更豐碩之研究成果。

參考文獻

- 王德威(2009)。《茅盾，老舍，沈從文：寫實主義與現代中國小說》，臺北：麥田。
- 林志宏(2009)。《民國乃敵國也：政治文化轉型下的清遺民》，臺北：聯經。
- 沈松橋(1997)。〈我以我血薦軒轅——黃帝神話與晚清的國族建構〉，《臺灣社會研究季刊》，第 28 期，頁 1-77。
- 沈松橋(2002)。〈國權與民權：晚清的「國民」論述，1895-1911〉，《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73:4，頁 685-734。
- 楊瑞松(2012)。〈打造共同體的新仇舊恨：鄒容國族論述中的「他者建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37 期，頁 43-72。
- 楊瑞松(2008)。〈黃河「變奏曲」：從自然景觀到國族符號〉，收入於《基調與變奏：七至二十世紀的中國(2)》(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中國史學會(日本)、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新史學》雜誌社)，頁 339-368。



楊瑞松 (2014)。〈從「正紅旗下」到紅旗下：老舍的「祖國」之愛〉, *Issues of Far Eastern Literatures: The 6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Saint Petersburg State University/Society of Lao She Studies*.

關紀新 (2008)。《老舍與滿族文化》，遼寧：遼寧民族出版社。

Anderson, Benedict. (1991).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Verso

Billing, Michael. (1995). *Banal Nationalism*. London: Sage